

大国竞争与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

鞠建东 刘 斌

摘 要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应对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国要正确处理三对关系：一是正确处理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国追赶美国的战略目标既是现实的，同时又具有挑战性，这就决定了我们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脱钩断链”，不谋求取代美国的世界霸权，也不谋求中美“共治世界”，而是保持双边之间有足够的“战略空间”，防止守成大国有意诱导所致的“战略透支”，避免过早陷入“追赶者陷阱”；二是正确处理与区域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提升市场吸引力，建立具有包容性和有秩序的亚洲市场；三是正确处理中国公共产品提供与全球创新共享之间的关系，既要提供符合自身实力的全球公共品，也要推进全球技术创新的共治共享，争取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提升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总之，中国应主动塑造自主战略机遇期，不断增强内生性、可塑性和延展性，推动建立亚洲共同体，逐步形成“三足鼎立”、“竞争共存”的全球经济秩序。

关键词 大国竞争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 世界秩序 亚洲共同体 新质生产力 全球治理

* 鞠建东，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083）；刘斌（通讯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政府管理学院研究员（北京 100029）。

** 本文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全球经贸规则重构背景下的 WTO 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1JZD023）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贸易开放、国内运输成本与南北经济差距”（项目编号：72173020）资助。

中国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的新时代经济发展战略包括战略目标、战略方针、战略措施三个层次。

从战略目标来看，“中国名义 GDP 在 2035 年前后赶上美国”是一个合适的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等同于中国人均 GDP 在 2035 年前后达到美国人均 GDP 的 1/4，也等同于今后 10 年左右中国 GDP 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5%。

从战略方针来看，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核心问题是中国主导的市场规模是国内市场、区域市场，抑或是世界市场？战略的核心是边界，边界过大会造成战略透支，边界过小会失去发展的“根据地”，“根据地”不牢，地动山摇！战略的边界要足以支持中国经济的发展，要能够支撑新世界秩序的构建，要给大国竞争的对手留出空间，要给中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带来利益、发展与稳定。从这几个方面考虑，本文认为，中国主导的合适的市场规模是 20—25 亿人口的区域市场，并提出“不称王、稳市场、谋共享”的九字对外经济战略方针。

战略措施服务于战略目标，而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在于中国能否顺利实现持续的产业升级，不断提高新质生产力。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我们的战略举措依赖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建立区域市场秩序，打破大国竞争对手对中国科技创新的遏制。其要点有两个：第一，通过“以市场换规则”的途径，建立“亚洲共同体”，在一个 20—25 亿人口的区域市场，尤其是技术、资本、数据等要素市场重拾并强化 WTO “非歧视性、公平竞争、贸易自由化、透明度”等基本原则，从而打破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封锁与遏制；第二，超越通过军事力量在地理区域建立秩序的传统途径，转而主要利用经济手段，通过对成员经济体的进入与退出进行动态管理的方法，构建“亚洲共同体”的秩序，愿意遵守共同体规则的成员获得进入共同体超大市场的利益，违反共同体规则的成员则失去这个利益。各个经济体按照自己的利益决定遵守还是违反共同体规则，遵守的进入，违反的退出。中国和“亚洲共同体”成员一起，有效维护成员的动态进入和退出，维持共同体的秩序与动态平衡。

一、大国竞争的目标与挑战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指出，“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即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展望二〇三五年……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①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是在大国竞争的国际形势下制定的。所谓大国竞争，是指世界秩序的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竞争。自 1820 年工业革命以来，大国竞争发生了五次，即英德之争、美英之争、美苏争霸、美日贸易争端，以及正在进行的中美竞争。对五次大国竞争进行历史总结可以发现，竞争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经济总量、科技、金融、军事和全球治理这六个领域。其中制造业和经济总量是大国竞争的前提领域，崛起大国的制造业水平逼近甚至超过守成大国，且前者的经济总量达到后者的 60% 以上，是两国进入大国竞争阶段的前提条件。

中国制造业在 2010 年超过美国，中国 GDP 总量在 2016 年达到美国 GDP 的 60%，因此，中美两国关系在 2016 年之后进入大国竞争阶段。21 世纪大国竞争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中国 GDP 总量赶上美国，大约在 2035 年实现，第二阶段是此后中国在科技、金融、军事和全球治理这四个领域逐步追上美国，大约在 2060 年实现。

结合“十四五”规划确定的 2035 年远景目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要求以及大国竞争的国际形势，可以将 2035 年的人均 GDP 目标定为达到美国 GDP 的 1/4。这个目标在总量上的含义是什么？2022 年，中国人口数量是 14.1218 亿，美国人口数量是 3.3329 亿，中国人口大约是美国的 4.24 倍。中国 GDP 为 17.96 万亿美元、人均 GDP 为 1.27 万美元，美国 GDP 为 25.46 万亿美元、人均 GDP 为 7.64 万美元，中国 GDP、人均 GDP 分别约为美国的 70.5% 和 1/6。

按照预测，中国人口数量在下个 10 年的年均增长率大约为 0.02%，而美国为 0.59%，到 2035 年中国预期人口为 14.01 亿，是美国预期人口数量的 4 倍。^② 如果 2035 年中国人均 GDP 达到美国的 1/4，那么中国 GDP 总量将在 2035 年追上美国。据一些机构预测，美国今后的 GDP 潜在年增长率为

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20 年 10 月 2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20 年 11 月 4 日。

② 《世界人口展望报告 2022》，<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

2%左右，按照这个假设，中国 GDP 总量要在 2035 年追上美国，就要求中国 2024—2035 年年均 GDP 增长率比美国高，达到 5%。

总结一下，如果中国人均 GDP 在 2035 年达到美国的 1/4，由于届时中国人口是美国的 4 倍左右，中国 GDP 总量将追上美国，这要求今后 10 年左右，中国 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 5%。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大国竞争第一阶段目标都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中国 GDP 总量在 2035 年追上美国！

这个目标既是现实的，又具有挑战性。回顾历史，日本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图-1 展示了美日人均 GDP 与 GDP 总量在 1960—2020 年的发展对比。从人均 GDP 来看，1960 年日本人均 GDP 是 475 美元，是美国人均 GDP（3007 美元）的大约 1/6。其后 10 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10 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8.47%，1970 年，日本人均 GDP 增长到 2056 美元，达到美国人均 GDP（5234 美元）的 39%，并于 1987 年赶上美国。从 GDP 总量来看，1995 年，日本 GDP 达到美国 GDP 的 72%，这是日本相对于美国经济规模的峰值，之后日本经济陷入停滞，1995—2005 年 GDP 平均增长率为 1.11%。2005 年，日本经济总量相对于美国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一路下滑到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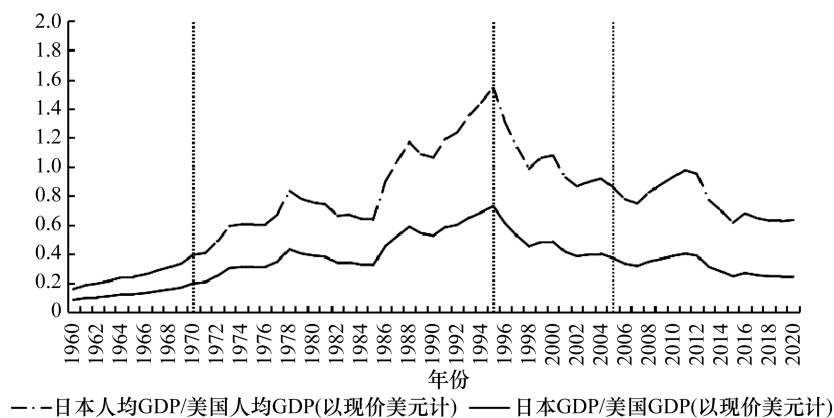


图-1 日美人均 GDP 与 GDP 总量历年对比

说明：2020—2022 年由于疫情冲击，数据未纳入。

参照日美的对比数据，中国现阶段相当于日本的哪个阶段？类似于 1960 年的日本，还是 1995 年的日本？如果从人均 GDP 的角度看，2022 年中国人均 GDP 大约是美国的 1/6，现阶段的中国相当于日本 1960 年的阶段，尚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即使达不到日本 60—80 年代 8% 的 GDP 年平均增长率，

中国今后十年的平均 GDP 增长率只要达到 5%，那么到 2035 年，人均 GDP 达到美国的 1/4、GDP 总量追上美国应该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如果从 GDP 总量的角度看，中国 GDP 已经超过美国 GDP 的 60%，类似于 1995 年美日大国竞争时的日本，中美大国竞争进入胶着状态，美国通过“脱钩”“断链”“筑墙”强力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且，中国 GDP 已经达到世界 GDP 的 18%，提高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变得愈发困难。中国今后 10 年可能面临日本式的危机。如果陷入类似于日本在 1995—2020 年的增长陷阱，中国今后十年与美国在经济总量上的差距甚至有可能扩大，GDP 总量追上美国的前景将面临艰巨的挑战。

中国人均 GDP 可以称为水平效应，中国 GDP 占世界的比重可以称为总量效应。从水平效应来看，中国经济尚具有高速增长的潜力；从总量效应来看，中国经济已然是全球经济中的庞然大物，在全球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的增长空间受到强力挤压，继续快速增长面临挑战。水平效应代表了“GDP 在 2035 年追上美国”这一战略目标的现实性，而总量效应则代表了其挑战性。

中国的战略方针就是要充分发挥水平效应的积极作用，尽量减少、避免总量效应的消极作用。避免总量效应的消极作用要求中国既不要在全球过度扩张，也不能失去“根据地”，这个战略方针可以用“不称王、稳市场”来代表。而发挥水平效应积极作用的战略方针可以用“稳市场、谋共享”来代表。“稳市场”战略的核心是建立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的大约 20—25 亿人口的“亚洲共同体”的市场秩序，这样既能减少总量效应的消极作用，也能发挥水平效应的积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稳市场”就是建立新型“亚洲秩序”。因此，本文将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总结为九个字：“不称王”，稳市场，谋共享。

二、“不称王”：大国的和平共处

如果今后 10 年中国 GDP 保持在 5% 左右的增长区间，中国名义 GDP 将会在 2035 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预测，2060 年，中国、印度、美国、欧盟分别是世界的第一、二、三、四大经济体，这四大经济体的 GDP 占世界 GDP 的份额大约为中国

26%、印度 18%、美国 15%、欧盟 12%。另外，由于人口下降的压力，中国 GDP 占世界份额将在 2050—2060 年达到峰值。通过综合对比上述数据，本文得到两个预测。第一，2035 年以后的 21 世纪，中国 GDP 将长期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第二，中国 GDP 占世界份额最高不会超过 30%，排名世界第二、三、四的任何两个经济体加在一起的经济总量都将超过中国。

回看历史，过去两百年的两大霸权国家，一个是英国，一个是美国。1860 年英国建立全球霸权时，英国的工业产值超过全球工业产值的 50%；1945 年美国在二战后建立世界霸权时，美国的 GDP 达到世界 GDP 的 53%。历史数据告诉我们，占不到世界 GDP 30% 的中国，在经济总量上不足以谋取世界霸权。按照这样的数据推理，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称王不可行，因为中国实力不足以建立全球霸权。第二，称王没好处，因为谋取世界霸权的成本大于收益。甚至当崛起国的影响力扩展损害了守成国既有的影响力格局时，守成国会通过争取盟友与崛起国竞争，进而引发阵营间的对立。^①第三，称王不应该，因为在 21 世纪的世界经济结构中，美、欧、中、印等大经济体将长期竞争共存，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能获得接近 50% 的世界份额，从而支配世界经济。这样的世界经济结构不支持任何国家的世界霸权，不支持美国的世界霸权，也不支持中国的世界霸权。

中国战略的核心问题在于应该主导何种规模的市场，是主导世界市场，还是区域市场，甚至仅仅是国内市场？中国主导的市场范围必须与自身经济实力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匹配，当前应该是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亚洲”，既不过度扩张到全球市场，也不能被“去中国化”，不能被压缩、封锁到国内市场。不过度扩张就是“不称王”，不被压缩、封锁就是“稳市场”。战略空间和势力范围的有限性既可以保证自身有足够的市场范围，也可以避免大国直接冲突，从而实现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正如习近平指出，“宽广的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②

分别来看，“不称王”就是不试图称霸世界，有两层含义，一是不试图取代美国的世界霸权，二是不与美国共治世界。

（一）不试图取代美国的世界霸权

下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为什么中国不试图取代美国的世界霸权，即不可

① 董作壮：《影响力制衡：主导国应对崛起国的关系性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 年第 8 期。

②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新华社，2014 年 11 月 12 日，中国网，http://cn.chinadiplomacy.org.cn/2014-11/12/content_77324240.shtml。

行、没好处、不应该。不可行是因为实力不够，没好处是因为对中国来说得不偿失，不应该是因为对世界来说得不偿失。

图-2 描述了中国主导的市场规模与中国的社会福利、美国的社会福利、世界的社会福利等三个指标之间的关系，社会福利大约等于收益减去成本，也就是净收益。横轴是中国主导的市场规模占世界市场的份额，最小仅仅局限于中国国内市场，用 x^0 代表。2022 年， $x^0 = 18\%$ 。中间的“亚洲”包括东亚、东南亚、南美、非洲等与中国市场紧密联系的经济体，用 x^* 代表。^① 世界是整个世界市场，用 $\bar{x}$ 代表， $\bar{x} = 1$ 。纵轴则是中国主导的市场规模分别给中国、美国和世界带来的社会福利。中国福利曲线、世界福利曲线都在中国主导“亚洲”时达到最高点，而美国福利曲线则随着中国主导市场规模的增大而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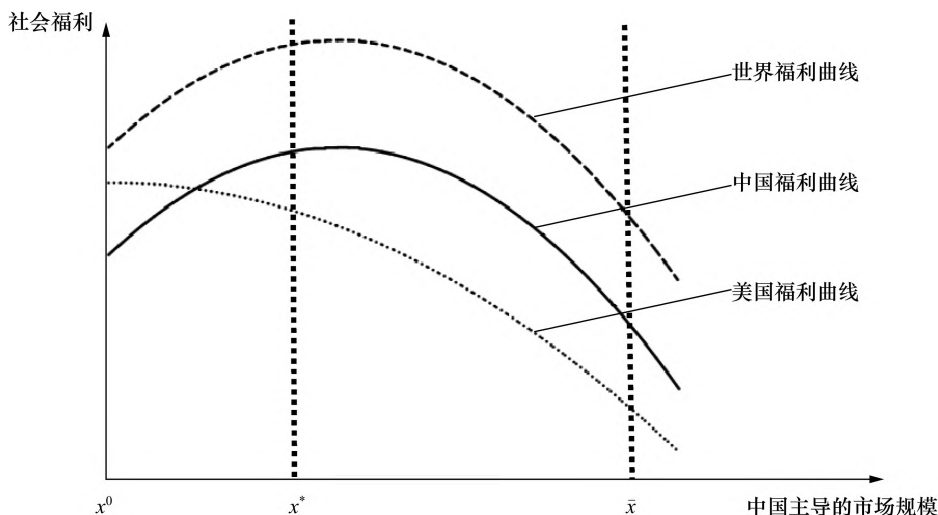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主导市场规模的福利曲线

首先，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权国家，现实并不可行。如前文讨论，即使在非常顺利的情况下，2060 年中国 GDP 达到美国 GDP 的两倍，虽然位居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也不到世界经济总量的 30%。而且，2060 年之后，中国人口下降的压力逐步增大，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份额的上升空间势必受到制约。

^① 本文的“亚洲”代表的不仅仅是地理区域的亚洲，也包括与中国市场紧密相连的其他区域经济体。

其次，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权国家，收益小于成本。主导市场的治理或者秩序与规则，一方面给主导国家带来收益，另一方面也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因而给主导国家带来成本。从收益角度看，当市场的规模扩大时，规模报酬也会增大。这种规模报酬首先来自规模扩大带来的企业生产成本的下降、产品多样化和产品质量的提升。所有市场内的经济体都会从市场规模报酬中获益，而主导国家会获得这种规模报酬中的较大份额。其次，当市场规模扩大时，市场的垄断利润也会增大，主导国家也会在市场垄断利润中拥有更大的份额。这两方面之和是主导国家因市场规模扩大而获得的收益。

从成本角度看，市场秩序属于公共产品，主要依赖主导国家的投入，包括规则制定、基础设施建设、安全维护与保障等。市场内的小经济体既无实力、也无激励提供市场秩序，通常只是市场秩序的搭便车者。而市场内的主导国家有实力、有激励、也有责任来主导市场秩序的供给。市场的规模报酬减去提供公共品的成本就是市场规模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净收益，也就是社会福利。

当中国试图主导比“亚洲”更大的市场，甚至试图主导全球市场时，由于尚未达到足够的经济实力，建立市场秩序的成本将急剧上升并超过收益，因此图-2 中的中国福利曲线在“亚洲”（中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份额为 x^* ）时，福利达到最高点，之后迅速下降。换句话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权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

第三，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权国家，不符合全球治理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适应的要求。图-2 假设世界福利曲线也在中国主导的市场份额为 x^* 时达到最高点。当前的世界秩序正从美国霸权向多元、竞争共存的世界新秩序迈进，美国已经无力主导世界市场，而全球价值链已经呈现出“三足鼎立”的格局（在亚洲以中国为中心、在欧洲以德国为中心、在美洲以美国为中心），所以当中国主导的市场规模从中国国内向“亚洲”扩展时，世界秩序适应了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变化，因而世界福利是上升的。但是，如果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权，那么世界秩序同样也与全球价值链“三足鼎立”的结构不相适应，世界福利将因此而下降。从世界福利的角度，中国也不应该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权。

（二）不与美国“共治世界”

2010 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 G2，即所谓的“中美共治”。这些年

来,“中美共治”不断成为中美关系、世界格局的讨论热点。其论据无非是美国带领盟国(G7)主导世界的“一超多强”的世界秩序已经难以为继,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紧密合作,共同主导世界秩序。也有观点认为,美国和中国各有所强,美国用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金融市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中美共治世界可以各用所长、各取所需。或者美国的资本与中国的劳动力绑定,中国资本让渡中国市场及其垄断利益给美国资本,美国通过国内政策补贴美国劳动力,继续获得美国工人对美国制造业外包到中国的支持,维持2018年之前的美国资本、技术与中国劳动力相结合的“超级全球化”。

所谓“中美共治”的前提是不改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国只是作为美国实力的有效补充,协助美国共同治理世界。“中美共治”实际上就是要求中国放弃独立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金融政策,要趋同、服从于美国主导治理体系,使中国的经济与金融体系和美国绑定。这种“中美共治”的观点似是而非,其核心问题是无视中国发展阶段的转变、中美关系的阶段性变化与中美利益冲突的结构转变。

在1978—2018的四十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工业化,其特征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在此阶段,中美优势互补,国家利益基本一致,美国技术、资本与中国低成本劳动力的结合共同推动了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符合双方的利益。2016年之后,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60%,中美已经进入“大国竞争”阶段,尤其是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爆发之后,经过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美国政府、社会、企业已经完成从与中国合作到与中国竞争、“去中国化”、全面遏制中国发展的转变,而中国的发展阶段也已经从工业化向知识化转变,从加工制造向技术创新转变,中国许多高科技企业和美国高科技企业在全世界市场已经处于竞争状态。2010年奥巴马提出“中美共治”,主要基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实力下降、中美利益从互补向竞争转变的战略考量,希望通过“中美共治”,将中美关系绑定在2010年之前的“小国—大国”阶段,以“中美共治”的形式实现“美国主导”的实质。后奥巴马时期,尽管美国政府没有重申“中美共治”,但目的近乎一致。特朗普政府要求中国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放弃政府的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支持。拜登时期的“小院高墙”,严控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投资,通过大规模发放美元支持美国与盟国的基础设施、科技研发与产业安全。

上述三个时期美国对华政策都有同一个目的，即压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维持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这些政策虽然名称各不相同，其实质都是诱导中国落入“追赶者陷阱”，使得美国研发和生产高科技产品、中国从事加工制造的国际分工模式得以强化、固化。如果中国掉入“追赶者陷阱”，就会步入“日本式危机”的增长停滞，2035 年经济总量赶上美国的第三阶段发展目标就无法实现。所谓“中美共治”，其实质是让中国“被动接受”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但这不是中国的最优选择。

中国“永不称霸”的立场一脉相承，从未改变。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矛盾日益尖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为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不仅改变了战后两极体系的格局，突破了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做法，同时在战略上指明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将以反霸权为主线。1974 年，邓小平在第六届特别联大发言时强调，中国属于并将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即使中国强大了，也永不称霸。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多次重申中国永远不称霸的承诺，2017 年 12 月，习近平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时强调，“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①

三、稳市场：“亚洲”经济秩序重构

中国不试图取代美国的世界霸权，不与美国“共治世界”，那么中国的最优战略是什么呢？就是独立自主，在 20—25 亿人口的“亚洲”市场建立中国主导的区域经济秩序，我们称之为“稳市场”。2021 年 1 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讲话强调，“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

^①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2017 年 12 月 1 日），《人民日报》，2017 年 12 月 2 日。

的雄厚支撑。”^①

中国不试图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权国家，并不意味着中国需要固守国内市场，这同样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图-2 中的“中国福利曲线”和“世界福利曲线”表明，当中国主导的市场规模为“亚洲”时，中国与世界的福利都达到顶点。所谓“稳市场”就是稳定、繁荣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亚洲市场”。随着中国主导的市场规模的扩大，美国的社会福利受到什么影响呢？首先考虑当中国主导的世界市场区域小于“亚洲”时的情况。一方面，当中国主导的市场规模增大时，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垄断利润下降，这会减少美国的社会福利；另一方面，当中国主导的市场规模从中国扩张到“亚洲”时，全球市场变得更加多样化、更具有竞争性，这对全球消费者包括美国消费者都有好处。假设美国在“亚洲”区域的垄断利润的下降大于美国消费者的收益，这样随着中国主导的市场规模的扩张，美国社会福利下降。当然，当中国主导的市场规模从“亚洲”扩张到“全球”时，全球垄断程度越来越高，美国消费者的效用也随之下降，因此，本文在图-2 中假设“美国社会福利曲线”一直下降。这就是说，中国主导的市场规模从“中国”扩张到“亚洲”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美国会反对中国稳定“亚洲市场”。美国不仅希望将中国主导的市场规模压缩在中国国内，甚至希望美国能垄断中国国内的高技术市场。因此，“稳亚洲市场”并不是一个可以自动实现的目标，而是一个需要依托自身超大规模市场吸引力、成功进行大国博弈才能实现的目标。具体而言，稳市场包括建立“亚洲”治理体系、稳技术市场、稳资本市场。

（一）推动“三足鼎立”的全球治理体系

建立 20—25 亿人口左右、与中国经济紧密相连的“亚洲”市场秩序是建设“三足鼎立”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关键，中国如能“稳亚洲市场”，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价值链、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价值链、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价值链的“三足鼎立”的全球经济结构就是稳定的。如果中国不能“稳亚洲市场”，那么就会被压缩到中国国内市场，最后中国国内市场也守不住，被美国主导的跨国资本、技术所垄断、边缘化，全球经济结构重回美国主导的格局。所以，一个以中国市场为核心、开放的“亚洲市场”将是中美双方的必

^①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一日），载《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412—413 页。

争之地。

“稳市场”战略并不是历史上的“高筑墙”战略。“稳市场”与“高筑墙”虽然在功能上都是稳定区域内社会、经济、军事形势，积累实力，谋求区域内稳定发展，但是“稳市场”与“高筑墙”在战略方向上有本质的区别。第一，稳市场是开放，而不是闭关自守。第二，稳市场不是筑墙防守，而是主动出击。第三，“亚洲市场”的概念超越了中国及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地理概念，也超越了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概念，主要是一个与中国市场紧密相连的“市场共同体”的概念。比如一些拉美国家、欧洲国家、非洲国家，虽然在地理上远离中国，但是在经济上和中国市场紧密相连，同样可以是“亚洲市场”的核心成员。第四，“稳市场”不像“高筑墙”那样隔离特定的地理区域，而是集中于市场治理体系的建设，其核心一是市场规则，二是市场的进入与退出机制，所以，其中“墙”就是“市场规则”。第五，“稳市场”是动态的稳定。一些国家和地区依赖中国市场的程度随时间而变化，当一个经济体非常依赖中国市场时，加入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亚洲市场”利大于弊，这个经济体将选择遵守“亚洲市场”的规则、加入“亚洲市场”，反之就会退出。只有让遵守“亚洲市场”规则的经济体进入，而违反规则者退出，“亚洲市场”的规则才能动态地、有效地运转。所以，稳定的不是市场成员经济体，不是一国一区的得失，而是规则以及动态的进入与退出。第六，“稳市场”和“高筑墙”在目的上有本质区别。历史上的“高筑墙”是为了配合“缓称王”，最终目的是称王、图谋天下。与之类似，三足鼎立与三分天下也有本质区别。历史上的“高筑墙”、“三分天下”等建立稳固根据地的最终战略目的还是图谋天下，而中国“稳市场”战略、“三足鼎立”的最终目的不是称霸而是竞争共存，这种竞争共存并不是“平行世界”，而是基于合作基础的竞争共存。称霸全球、取美国而代之“不可行、没好处、不应该”，建立稳定的“亚洲市场”秩序，从而形成竞争共存的新世界秩序是最优目标。

（二）构建“亚洲市场”秩序

“稳亚洲市场”目标具有可行性。亚洲主要区域的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均显著高于其对美国、日本的贸易依存度。多数亚洲国家或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说明亚洲经济体越来越依赖中国，当前中国在亚洲地区的“核心国”地位已经形成。

“稳亚洲市场”需要建立市场秩序，也就是“亚洲共同体”的建设。“亚

洲共同体”的规则与治理体系，即亚洲秩序，是“亚洲市场”的一个公共品，主要依赖作为“亚洲市场”核心的中国来推动建设。

建立“亚洲”秩序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主导制定亚洲共同体的规则与治理体系。第二，保持“亚洲”市场的稳定与繁荣。第三，维护成员经济体的动态进入和退出。亚洲共同体是一个动态的共同体，成员的进入与退出是常态，经济体按照自己的利益决定进退，遵守规则者进，违反规则者退。中国应该和亚共体成员经济体一起，有效维护成员的动态进入和退出，保持亚共体的动态平衡。第四，主导协调亚共体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对外经济关系。随着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和消费结构升级，亚洲共同体的“体内环流”可以形成“中国研发设计—亚洲国家或地区和中国共同生产—中国消费”的闭环，进而降低对美依赖度。更为重要的是，“亚洲共同体”的建立还有利于增进亚洲价值链与美洲价值链、欧洲价值链的“体外环流”。亚洲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生产地区，同时也是未来世界最大的消费地区，美国与中国价值链“切割”相对简单，但美国试图与亚洲价值链“切割”难度很大。美国有可能“去中国化”，但是无法“去亚洲化”。亚洲共同体的建立将使美国的“去中国化”战略不可能实现。亚洲共同体的建立有利于进一步巩固中国在亚洲价值链和美洲价值链体系中的枢纽作用，提高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韧性。

本文所倡导的亚洲秩序并不是亚洲版的“门罗主义”。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美国不干涉欧洲国家的内部事务，也不容许欧洲国家干预美洲的事务，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后来更将美洲划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中国建立“亚洲”秩序与之根本不同。第一，亚洲共同体或者“亚洲”市场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与中国市场紧密相连的经济体的共同市场，主要是一个经济或者市场的概念。比如说，有些非洲国家高度依赖中国市场，也可以是亚洲共同体的成员。因为中国是这个“亚洲”市场最大的经济体，必然担负起提供秩序等公共品的责任。而门罗主义主张地理分割，将美洲视为美国的后院，不允许世界其他国家干预。第二，《门罗宣言》的发表源于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强调美洲的独立，反对欧洲列强对美洲的殖民，但是门罗主义也成为美国干涉拉丁美洲国家主权的代名词。有别于门罗主义对他国主权的干涉，“建立亚洲秩序”是在尊重他国主权前提下对“亚洲”市场规则的维护。门罗主义是地区霸权，把美洲划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实质上是对拉丁美洲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主义。而在亚洲共同体

中，中国并不干预成员国的内部事务，由成员国自主决定是否加入亚洲共同体、遵守“亚洲”市场秩序。当成员国违反“亚洲”市场秩序时，中国不是像美国那样去搞政变、推翻主权国家政府，而是让违反规则的国家退出“亚洲共同体”。第三，门罗主义在提出初始，国际主流的政治制度是君主专制制度，国际关系准则是基于权势平衡的均势政治，殖民制度盛行。门罗主义提出“非殖民原则”，适应了拉美各国寻求独立的潮流，同时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为国际社会注入新的选择，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发展方向。后来尤其是 20 世纪美国称霸世界之后，门罗主义演变成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意识形态输出。相反，“亚洲共同体”鼓励、尊重成员经济体的文化多样性、制度多样性，不输出意识形态。第四，门罗主义是孤立主义，“亚洲共同体”是开放主义。“亚洲共同体”是“三足鼎立”中的关键“一足”，是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关键支撑。门罗主义是霸权主义的旧世界秩序的产物，而“亚洲共同体”是新世界治理体系结构的一个部分。新世界治理体系将全球秩序划分为全球公共品与区域公共品的双层体系，“亚洲共同体”、美加墨自贸区、欧盟以及其他区域合作机制共同构成相互支持、相互合作、互相开放的区域治理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第一，“不称王、不谋求全球霸权”与“稳定亚洲市场、建立亚洲秩序”是大国竞争战略中互相支撑的一体两面，缺一不可。如果不能稳定“亚洲市场”，那么“不称王”就有可能演变成“去中国化”、被孤立、被边缘化。相反，如果过分扩张、到处出击、与美国争霸全球，就无法在“亚洲”建设规则制度、软性与硬性基础设施，会使得力量、资源过于分散，反而使得“亚洲”也稳不住、守不住。确定中国主导的市场规模，即“亚洲市场”的有限范围，有序、有力、有效地建立“亚洲市场”的秩序是现阶段战略的核心。第二，以技术、数据、人力资本推动的新世界，与以物质资本推动发展的旧世界，在“稳定根据地、积累实力、谋求发展”的战略目标上是一致的，但是具体方式有本质区别。“稳市场”并不是建立地理上的势力范围，而是在全球市场尤其是全球技术、数据、资本市场形成稳定的市场份额，建立有约束力的规则制度。

1. 稳技术市场

当代大国竞争的核心是科技竞争。首先，在中美大国竞争的制造业、经济总量、科技、金融、军事和全球治理六个领域中，科技竞争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其他五个领域的竞争。其次，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就是图-3 所示的

“创新—市场”的循环，没有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就没有增长，为了实现GDP年均增长5%的目标，中国必须稳定技术市场，实现“创新—市场”的良性循环。最后，美国系统地、坚持不懈地推进的“去风险”大国竞争战略可以总结为两点：第一是技术上遏制中国，确保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第二是在制造业方面去中国风险，降低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试图实现美国的制造业回流与“再工业化”。中国对美国“去风险”的反制措施就是“稳技术市场”，防止美国在核心技术上“卡脖子”，降低在核心技术上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图-3 中的“创新—市场”循环揭示了技术创新的基本机制：企业首先进行研发投入，带来技术进步；更好的技术会帮助企业的新产品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带来更高的利润；丰厚的利润又使企业有实力做进一步的研发投入，从而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研发投入、技术进步、市场份额、利润这四个变量之间都是正反馈关系，四个正反馈关系构成了一个技术进步的闭环，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受阻，技术进步都无法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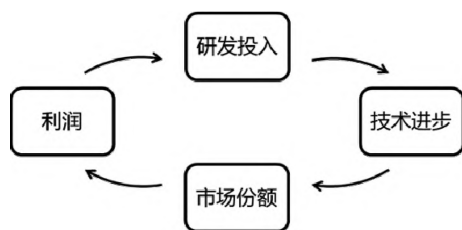


图-3 “创新—市场” 循环

一个国家（或者企业）的“创新—市场”循环如能顺利运转，这个国家（或者企业）就会持续不断地实现技术进步，并获得不断增加的高科技产品市场份额，从而实现经济增长。需要注意的是，当两个大国在世界市场竞争时，一个国家的世界市场份额的提高意味着另一个大国世界市场份额的降低，这将使两个国家在技术竞争上出现分化，即市场份额高者技术进步快，而市场份额低者技术进步慢，最终带来技术上的国际分工，即技术领先者生产高技术产品，而技术落后者生产低技术产品。

如果追赶（崛起）国的“创新—市场”循环不能顺利运转，那么追赶国在研发竞赛中就会落败，在国际市场上进入“低研发投入→技术停滞→低市场份额→低利润→低研发投入”的恶性循环，陷入“追赶者陷阱”。只要领

先（守成）国能够保持自己的“创新—市场”循环，同时又让追赶国的“创新—市场”循环得不到实现，那么领先国就能赢，而追赶国则会陷入“追赶者陷阱”，经济发展停滞并陷入恶性循环。苏联和日本就曾是这样的追赶国。如果追赶国能够实现“创新—市场”循环，在技术上超越领先国，使得领先国的“创新—市场”循环无法实现，那么追赶国就能实现技术超越，打破“追赶者陷阱”。

中美技术竞争的核心是：美国试图诱导中国，像当年苏联和日本那样落入“追赶者陷阱”。而中国则试图实现自己的“创新—市场”循环，打破“追赶者陷阱”。美国要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可以在研发投入、技术进步、市场份额、利润实现这四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进行阻断，然而，最为关键的环节则是市场份额：中美两国谁占有更大的高科技市场份额，谁就能在高科技市场实现更高的利润，就能以更大的规模进行下一步的研发投入，从而在两国的研发竞赛中胜出。

在高科技核心技术的世界市场上，尤其在人工智能、半导体领域，美国现在占有绝对优势。以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为例，手机操作系统主要是美国谷歌公司的安卓系统和美国苹果公司的 IOS 系统，两者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 99%，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上，这两大系统也同样占到中国市场份额的 99%。

为了稳定中国和“亚洲”技术市场，实现“创新—市场”的良性循环，中国必须打破国际技术在中国和“亚洲”区域的垄断。我们将国际技术垄断（“亚洲市场”的核心技术被区外跨国企业垄断）定义为区外企业的市场份额超过 70%。国际技术垄断是垄断的一种特殊形式，与单纯的市场垄断有三方面的区别。第一，在大国竞争的情形下，压制崛起国的高科技发展是守成国的战略目的，因此国际技术垄断损害了中国的技术安全，比单纯的市场垄断危害更大。第二，对于国际技术垄断，由于国内没有跨国公司母公司的管辖权，不能通过拆分的方法保护市场竞争。第三，国际技术垄断不单纯是企业垄断，通常是由政府支持的技术垄断。因为国际技术垄断是政府行为，已经超越了市场垄断带来的危害，必须通过政府行为加以反制。

美国与中国技术竞争的主要诉求就是“市场准入”与“技术遏制”。以手机市场为例，以“市场准入”的名义要求中国开放手机市场和电信市场，由此苹果等手机就可以占据中国的高端市场。与此同时，以“反强制性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出口管制”等技术保护的名义限制中国国产芯片、操作系统等技术的发展，通过严厉的技术封锁打压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

司，使得中国的高端芯片、操作系统等技术市场被美国技术所独占。其结果就是美国的“创新一市场”循环得以良好运行，而中国的“创新一市场”循环被打断。中国亟需打破“市场准入”与“技术封锁”的政策陷阱。中国市场的开放是全面的开放，产品市场与技术市场应该同时开放。从政策上，美国等发达国家要想进入中国的产品市场，就要允许技术进入中国市场，不能产品市场进入、技术市场封锁。中国产品市场的开放、非歧视，以对方技术市场的开放、非歧视为前提，这是“以市场换规则”的核心。如果对方在技术市场上对中国“去风险”，那么中国就必须必须在技术市场上“反国际垄断”。

要从根本上解决国际技术垄断问题，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培养本土技术的竞争力。在战略竞争压力下保持自主创新、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是当前有效参与大国战略竞争的重心。^①而本土技术的竞争力，需要一定的市场份额来培育、发展。因此，通过政策保护本土技术享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成为反国际技术垄断绕不过去的手段，无非是什么样的政策效率更高、市场干扰更少、成本更低。

通过政策保证中国核心技术至少占有30%的中国市场份额是反国际技术垄断绕不过去的目标。我们以手机操作系统为例对反国际技术垄断问题进行政策探讨。假设安卓和苹果IOS系统占有“亚洲共同体”市场的99%，超过了70%的上限，构成了在亚共体市场的国际技术垄断。谷歌与苹果都是美国企业，“亚洲共同体”无法拆分这两家外国企业，反垄断政策只能从市场需求端执行。手机操作系统的下游需求端为手机，因此反垄断政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要求手机企业在“亚洲市场”销售的手机总量的30%，必须使用“亚共体”成员国生产的操作系统。亚共体将对违反这个要求的企业生产的手机产品征税，税率按照总出货手机中使用亚共体操作系统的比例征收，比例越小，税率越高。第二，补贴使用“亚洲”操作系统的手机。举例而言，在“亚洲市场”上销售的“小果”手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使用进口操作系统的，我们称之为“小果A”，一种是使用“亚洲”操作系统的，我们称之为“小果B”。当“亚洲”操作系统还没有达到进口操作系统的水平时，“小果B”的质量会低于“小果A”，“小果B”的市场价格甚至会低于生产成本。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将补贴出售的每部“小果B”，保证“小果B”的利润率。

^① 黄琪轩：《大国战略竞争与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变迁》，《外交评论》，2020年第3期。

尽管直接扭曲价格的补贴在 WTO 规则中并不被允许，但对方如果实行技术制裁，那么中国也可以在 WTO 框架内进行“适度报复”。和美国政府在美国、欧洲以及美国其他盟国的市场上大范围禁止使用中国 5G 技术相比，以上的反国际技术垄断政策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政策。

近年来，华为公司在技术上实现了突破，特别是在自主研发的手机芯片和 5G 技术领域，重返高端手机市场。我们一方面为华为的技术突破而备受鼓舞，另一方面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单个企业的技术突破带有偶然性，不足以建立“创新—市场”循环。只有持续、透明、长期的“反国际技术垄断”政策，才能培育良性的“创新—市场”循环。

2. 稳资本市场

“亚洲市场”的稳定要求亚洲资本市场的稳定。全球价值链区域化与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基本矛盾在加剧，而解决这个基本矛盾就要求建设亚洲货币体系、推进亚洲资本市场一体化。在建设欧洲货币体系、欧洲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德国马克扮演了区域核心货币的作用，与此类似，人民币成为“亚洲市场”核心货币的进程需要加快。

人民币如何才能成为“亚洲市场”核心货币呢？首先，人民币要和美元解绑，建立浮动汇率制度。其次，亚洲各经济体原来与美元挂钩的货币逐步脱离与美元的绑定，转而与人民币挂钩。在 2019 年下半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破 7”之后，中国央行退出了对人民币的常规干预，人民币汇率在转向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机制上迈出实质性步伐。2022 年下半年，人民币汇率出现升值趋势，中国出口承压，2023 年人民币汇率又出现贬值压力。中国央行是否应该干预汇率浮动、稳定汇率呢？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是人民币成为“亚洲市场”核心货币的必要条件，中国不能为了短期汇率稳定而影响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这个基石。要让人民币与美元解绑，降低国际金融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亟需新的政策工具来有效地隔离人民币与美元，在三个国际金融体系基本变量（资本市场开放、汇率、货币政策）之外，加上第四个变量——“跨境资本流动累进税”的设计就显得特别有意义。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第四个政策变量，“跨境资本流动累进税”增加了一个维度的政策空间。比如，当人民币有升值压力时，出现更多的资本流入，可以调高基准的跨境资本流入税率，抑制资本流入，减缓人民币升值压力。当人民币有贬值压力时，可以调高基准的跨境资本流出税率，抑制资本流出，从而减缓人民币贬值压力。这样，通过“跨境资本流动累进税”的政策设计，不仅可以防范国际金融危机，而且可以有效地隔离人民币与美元。

综上，在复杂多变的国际金融市场，稳资本市场不是“高筑墙”，而是通过主动制定新的资本市场规则来规避风险、稳定市场。“浮动人民币汇率制度”与“跨境资本流动累进税”的结合将成为稳资本市场的政策利器。在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政策体系下，中国可以主动出击，加快构建“亚洲”资本市场的步伐，使人民币国际化有量级上的飞跃。

四、谋共享：重构全球利益结构

共商共建共享一直是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观的核心原则。中国倡导国际政治关系、国际经济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所谓“共享”就是全球治理体系要由所有国家一起建设，治理成果要由所有国家一起分享。这种共享不仅包括产品生产分工、要素自由流动，还应包括前沿技术的合作创新。

中国经济保持健康、高速增长，将推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增长，因此，中国目前阶段的战略目标，即中国经济总量在今后 10 年以年均 5% 的速度增长，本质上与全球人民社会福利的改善是一致的。中国人均 GDP 逐步接近美国，中国的经济总量在 2060 年前后达到美国的两倍，随之霸权迭代的世界秩序历史将终结，多极化、竞争共存的世界新秩序即将到来。正如习近平所多次指出的，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历史潮流势不可当。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中国的战略目标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而美国遏制中国的发展则是要违背这个趋势。中国的战略是顺势而为、拾阶而上，本质上，是与世界各国人民共享长期、稳定的增长。

从共享种类看，谋共享主要包括机会共享、市场共享、发展共享、经济安全共享、技术共享等诸多方面。从共享主体看，可分为共享提供方和共享受惠方。在市场共享、发展共享等方面，中国无疑可以作为主动提供方。第一，向世界提供公共品，包括提供稳定的“三足鼎立”的世界秩序，防范气候风险和现有技术垄断带来的世界局势动荡。第二，提供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也就是市场贡献。随着中国经济的健康增长，中国商品市场规模将迅速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市场，以及全球企业最重要的盈利来源。第三，全球最大的商品生产国。2010 年之后，中国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将保持全球最大、最具韧

性、最高效的制造业国家的地位，全球价值链的安全、高效运行依赖于中国制造的正常运转。第四，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输入）国，也就是发展共享。中国是全球储蓄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最大的净资本输出（经常账户顺差）国家。2022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1465 亿美元，连续十一年位列全球前三。同时，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达到 1891 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中国资本成为全球产业投资最大的来源地。

在全球创新时代，最重要的共享是思想、知识与科学技术的创造与共享。但当前创新技术的共享并没有真正实现，主要因为发达国家掌握着科技霸权。美国在二战后建立了全球最有效的科研、高等教育体系，这个体系强调个人自由和知识产权保护，强调私有、分散与自主，忽视了作为创新源泉的思想和知识本质上是公共品，忽视了伟大科学家的科技成果建立在无数普通科技人员的努力之上，人类创新本质上是集体行为。美国的科研、高等教育体制鼓励个人自由，但忽略了美国国内贫富差别的不断扩大，科技公司越来越严重的垄断。二战后，美国成为全球科研、高等教育的中心，集中了全球最高水平的科研机构、最好的大学，各国的优秀学生纷纷前往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在美国的大学、科研机构、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并将创新成果传播到全世界，同时，美国也建立起科技霸权，并据此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美国的科技创新变成了美国对世界的科技霸权、对其他国家的技术遏制与对世界市场垄断利润的掠夺。

AI 时代的核心挑战是技术精英垄断与全人类技术共享的矛盾。以色列历史作家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描述未来世界可能会出现“神人”，就是技术精英控制算法，算法控制机器人，机器人控制普通人，这样的场景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如果出现这样的场景，神人是不是永远可以做神人？人类社会有可能陷入数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动荡，因为一旦出现“神人”奴役全人类，“神人”就会被打倒，诞生新的“神人”，人类社会将陷入数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动乱、黑暗的循环往复的状态。

我们应该怎么办？AI 技术的产品是自然垄断，如 ChatGPT 大模型、人脑芯片等 AI 产品具有很强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固定成本巨大，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如果对市场不加干预，AI 的核心产品就会出现全球市场垄断、少数技术精英垄断全球人类智能的情形。所以，对于 AI 时代一定要进行制度设计，通过制度设计防止对全人类智能的垄断。

如何进行制度设计？诸如苹果、微软、亚马逊、特斯拉等超级科技公司

的力量已经超过中等国家的实力，只有美国、中国、欧盟三大经济体的政府能够抗衡。保证核心产品的竞争是在 AI 时代保证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最起码的要求。美国、中国、欧盟政府需要合作，共同干预全球大模型、人脑芯片等 AI 核心产品的全球市场结构，反对市场垄断，保证全球至少要有六家企业，美国两家、中国两家、欧盟两家，保证 AI 核心产品最低限度的市场竞争。从这方面来看，美、中、欧“三足鼎立”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全球技术共享而不是垄断的制度保证。

新世界的创新有四个本质要求：第一，由全人类共同参与；第二，成果为全人类所共享；第三，推动世界共同发展；第四，人性在创新活动中得到升华。我们寄希望于中国为新世界带来一个共创、共享、共同发展、共同升华的创新、教育体系。

结 语

正如 2023 年中国外交部发布的《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① 这种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实质上重申了中国“不称王”的大国战略观。2020 年 4 月，习近平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在本质上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构建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构建的重要抓手是超大规模国内市场，通过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资源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稳市场”、“谋共享”的战略思路实际上是新发展格局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具体体现，“稳市场”的关键是超大规模市场，通过国内大循环实现对“亚洲市场”的稳固。“谋共享”的关键是实现技术、人才等高端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动，有效抵御外部市场的“脱钩断链”。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辉煌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奋斗实现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

^① 《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外交部网站，2023 年 9 月 13 日，https://www.fmprc.gov.cn/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202309/t20230913_11142009.shtml。

于牢牢把握住了发达国家生产全球化的战略机遇期，当时的战略机遇期更多依赖于“他塑”，或者是“他塑”与“自塑”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加剧，逆全球化潮流涌动，“他塑”的战略机遇期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们亟需通过塑造自主战略机遇期和新动能新优势，获得新的发展空间，释放新的发展潜力。

塑造战略机遇期的核心就是在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 20—25 亿人口的区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亚洲”，重构市场规则，其路径是“以市场换规则”，其政策抓手就是建设“亚洲”共同体。二战后美国推动建立 WTO 机制，WTO 规则符合绝大部分国家利益，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动开放市场，其他国家通过“较低市场开放+搭便车”的模式推动了多边体制的形成。尽管当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摒弃了设立 WTO 时的理念，但不可否认，这种大国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念值得借鉴。在新时代，我们仍然要高举 WTO 规则的旗帜，维护多边主义，通过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吸引力和单边开放模式，在“亚洲”构建区域经济规则，拓宽中国的市场空间，促进区域内技术创新的共治共享。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关键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方面，加快推进区域大市场的形成，降低区域内新质生产力要素流动成本，防止区域内市场割裂和要素配置的扭曲。另一方面，通过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引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外部竞争机制，通过“谋共享”策略促进全球创新要素集聚。通过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对接，特别是与数字贸易、低碳等新规则的对接，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

（责任编辑：李 丹）

FOREIGN AFFAIRS REVIEW

Bimonthly Volume 41 Number 4 2024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JU Jiandong LIU Bin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internal conditions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Chinese economy have changed dramatically. In the face of new chances and challenges, China should deal with three pairs of relationships appropriately. The firs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established powers. The strategic goal of China to catch up with the U. S. is both realistic and challenging. This determines that China should not only oppose “decoupling”, and refrain from seeking to replace the U. S. hegemony or a G2 with the U. S. to govern the world, but also maintain enough “strategic space” with the U. S. bilaterally, restrain “strategic overdraft” induced by established powers, and avoid falling into the “catching-up trap”. The second relationship is that of China with regional economic order. China ought to on the one hand, enhance the attraction of its own market, and on the other, build inclusive and orderly Asian market based on such an oversized market of its own. The third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and sharing of global innovation. China needs to provide global public goods in correspondence with its ability, promote joint governance and sharing of glob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eek to improv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increase its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ule-making. In conclusion, China should take proactive actions to create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enhance its endogeneity, plasticity and stretchability. In the meantime, China should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n Asian community and a “three-legged” global economic order of competitive co-existence.

Key words: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world order, Asian communit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glob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 Operation Cost, Risk Preference and Revisionist Hegemon: The Evol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ional Strategy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QI Shangcai ZHANG Yun

Abstract: Will an established power become institutional revisionist? In classic IR literature, an established power is typically the constructor and defender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while a rising power is the revisionist. However, the challenges the United States have posed to the global system of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in recent years suggest that an established power can also be a revisionist. Based on two assumptions that institutional power is a specific form of power, and that the cost of building an institu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maintaining it, the paper argues that institution operation cost and risk preference are two key variables that determine the established power's shifting towards revisionist institutional strategy. While an established power constructs institutional hegemony by including the rising power into the institution, the growth of the rising power's institutional power leads to continuous rise of institution operation cost and institutional restriction for the established power. Ultimately, the established power must make a choice between giving up or reconstructing its dominant status. To avoid the unfavorable prospect of competition within the institution, the established power turns to revisionist institutional strategy driven by risk preference.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s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was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emerging countries wer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However, as emerging countries produce increasing impact on the decision-making of institutions, the United States starts to challenge the global system of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and tries to deprive emerging countries of their institutional power by rebuilding exclusive institutional system. Clarifying why and how an established power adopts soft revisionist institutional strategy, the paper may contribute to complementing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bear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maintaining multilateral global order.